

【我的抗战】(一)信仰的历程:

从心向共产主义到投身党组织工作——袁超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开设《我的抗战》专栏,主要收录即墨抗战时期当事人或见证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汇聚蓬勃伟力,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袁超(1919.07—1998.04)

我生于1919年7月(农历),出身中农,毕业于县立(原长直)第三完小。幼年时常听父亲说起北伐军(当时称南军)所到的地方均免除税收与租息,因为我的父祖及以前几代都是农民,所以极盼望官府能体谅劳动人民的痛苦。后来读私塾时,受孟子“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君为轻”论点的启发,略知一点从政者应有的要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辽宁大学学生流亡团到关内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他们到我所在的学校演讲宣传时痛哭流涕,捶胸顿足,阐述亡国之痛,当亡奴之苦,使我幼小的心灵大受感动。加以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课本,逐渐有了粗略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自豪感,仇视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深入脑中,由此产生了献身于救国事业的想法。尤其是在学校生活中,同学间贫富不均比较明显,我开始产生愤世不公的念头。后来这批学生要到县城宣传时,校长徐中周说:“城里来电话,说这批人是共产党,拒绝他们进城。”当时(1931—1932年)报纸上不时出现上海破获共产党机关的报道,共产党令我感到神秘。我从文字上反复理解“共产”的含义,内心极向往共产党。

之前,我经常与徐政权(又名

徐达三、徐坚如,大信街道袁家屯村人)写信交流,了解他宣传的一些思想。1933年底,徐政权同志回家时,我进一步与之交谈,听他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及救国救民的道理。他告诉我真正救国救民的是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这样,我思想上更加仰慕共产主义,并提出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多次与之进行深细的谈论。他多次宣传讲解苏区的情况与制度,如:平分土地、红军中的团长士兵相互称同志等给我的印象最深,还特别宣传了苏联的情况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由此,我仰望理想的新社会,愿意为之实现积极参加工作。

1934年2月间,徐政权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介绍徐正福、袁世清(化名永山,退休于枣庄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小组。由于人少,实行党员、团员混合编组,我当选为小组长。后来,我又介绍袁毓江、徐兴华、孙友诰入党,并成立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1934年秋,从北平来了王毓光(又名魏思文、王振兴)、杨慎仙(女,又名黄秀芝)两名同志。王毓光在下普东村开设一处爱民诊所,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工作。杨慎仙在袁家屯办起一所小学,动员一些思想上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将他们的子女送去上学,以该学校作为开会及活动的掩护场所。后来在该小学上学的学生有不少

人参加革命,一部分成为干部。如我的侄子袁渤(袁淑明第三子,1942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伍。先后在胶东军区、南海独立一团任职,曾任江苏省军区连云港警备区副政委,参加过胶东解放、长山列岛解放战役,1981年离休。),九江机械厂干部孙友晓等。

由于工作积极,经组织考核,1934年8月,我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4年冬季,王毓光、徐政权、杨慎仙三名同志离开即墨前,将普东村王玉田、孙志温、王作传、王作松、王作书等组成的普东支部与袁家屯支部组合成区委(中共即墨第七区委员会),由我任书记,王作传、王玉田、孙志温任委员,并宣布徐政权与杨慎仙调离即墨,我们以后的工作由王毓光领导。

相关链接:

袁超,原名袁淑耀,1919年7月出生,即墨袁家屯人。193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即墨最年轻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高昌平三县边区书记,南海特委常委、民运部长,五总队政治处主任,胶东区南海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胶济铁路胶东区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海地委副书记、胶东区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胶东荣军总校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一〇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华东海军学校第一大队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海军后勤政治部副主任;海军联合学校四分校政委;海军后勤学校政委;炮兵学校副政委;上海市打捞局副局长;工交党校副校长等职。1985年12月离休。1998年4月22日在上海病逝。

此文是1984年9月13日袁超给即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来信,讲述他当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

(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供稿)



袁家屯党支部旧址。

国永梅

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墙角的那个修鞋铺,是很偶然的机会。可自从知道之后,每次修鞋,总会首先想到它。

那天午后随意溜达,便看见了街角有一个极简单的修鞋铺,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埋头修鞋。想到脚上的鞋子正需要换一个鞋跟垫,就走了过去。

男子示意我坐下,我脱下鞋子递了过去说:“换一下鞋跟垫,要走路不发出嗒嗒声的。”他并不说话,拿起前面的一本稿纸本,用圆珠笔写:“好 20元,一般 15元。”然后抬起头用目光询问我的选择。我有些诧异,用手指了指“20元”。他点了点头,极其娴熟地操作起来。

他面前的稿纸本,说是本子,其实就薄薄几页,可能因使用时间久了,四面已经卷了边,颇有些破烂。本子上的字并不成行,零乱地写着这样的短句:共30元,共20元,不能修了、明天来取……想到他刚刚的行为,我的心蓦地沉了一下,莫非他不能说话?

我坐在他面前的小马扎上,等着他把鞋子修好。他的摊儿,摆着的全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小钉子、碎皮子、鞋油、胶水、锥子、磨石、剪子……一如极不起眼的他,披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头发几乎全白,粗糙的手上全是厚厚的硬茧。

鞋子修好了,他递给我,指了指先前写下的“好 20元”的字样。我扫了他面前的微信码,付钱时输入了“50”的数字,对他笑了一下。

离开修鞋铺,我有些说不出的酸楚和沉重。不知道这个不能说话的老人,是因了何,又是从何时开始,就听不到这个世界各样的声音了,也无法用自己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诉说喜怒哀乐。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吧。周末收拾家,看见了去年买的一双新鞋,总觉得鞋跟有些高便一直搁置着。突然想到了那个修鞋的老人,便提着鞋子出了门。出门后,老人那用来写字卷了边薄薄几页的稿纸本浮现在眼前,我便又退回去,找了两本新的厚厚的笔记本,两支新的碳素笔,连同鞋子放进袋子里,方安心出门。

我先把鞋子递给他,然后在带去的本子上写下修鞋要求,又补充了一句:“上次过来见你的本子要用完了,这次给你带来两个本子和两支笔。”他笑了,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于是,我便也跟着他笑。阳光暖暖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阳光和煦的味道。

鞋铺里还坐着几个人,看上去应该是老顾客了。他们告诉我,这个老人是因小的时候的一场疾病失去了听觉,在这里修鞋很多年了,手艺很好,如果是连他也摇头的鞋,那就应该丢掉了。

我望向老人,他安详地坐着,专注着手中的活,一丝不苟,似乎整个世界静谧得如同只有他、他眼前的修鞋摊、他手中的鞋子和落在他身上的阳光。

一个顾客的鞋子修好了,他在我带去的本子上写下“15元”,顾客掏出了20元,对他摆摆手,示意他不必找零钱了,走了。我的鞋子也修好了,他写下了“25元,收你20元”,指了指我带去的本子和笔。坐着的与他熟识的老顾客对我说:“你给他带了本子和笔,他这是要少收你五块钱,表达感谢呢。”可是这次我的鞋子要把鞋跟先切去一小块,要比上次费事得多,于是,我依旧微信扫码付了50元。他笑着对我点着头,算是与我再说见。

这个修鞋铺没有字号,我也并不知道老鞋匠的名字。公路上喧嚣车辆长短的鸣笛,也都与他无关。他就那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不停接过顾客递过来的鞋子,有的鞋跟磨偏了、有的鞋子开线了、有的鞋帮裂口了……他粗糙的手仿佛被上帝亲吻过,几乎所有“受过伤”的鞋子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慰藉。人们接过修好的鞋子,重新穿在脚上,觉得比以前轻快舒适多了。

有时候想,他不只是个修补鞋子的人,亦是一个修补世界的人。我们应当相信,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人间,无论是多么平凡,多么寻常,总有一个角落会将他搁置,总有人需要他的存在。即使在狭小的世界里,守着简单的安稳与幸福,不惊不扰过一生,亦是活出了生命别样的美与高貴。

或许,这也是人们自然而然选择了多付点修鞋费的原因,不是施舍,不是怜悯,只是人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暖意,来“修补”一下修鞋匠那无声的世界。

墙角里有一个修鞋铺